



□ 王莉丽

近年来，中国的智库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智库本身的机制构建和思想创新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从目前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来看，一些突出的问题值得深思、突破和改进。

当前智库建设中需解决的问题

避免定位出现混乱。目前，中国智库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化、泡沫化、低水平传播等倾向。近几年智库数量大幅上升，但有一些商业机构以及完全不具备智库建设基本资质的机构也摇身一变成为智库，导致智库泛化现象。个别智库在运行机制和研究团队建设尚未完善，还未有高质量思想产品，尚停留在形式建设阶段的情况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影响力拓展，使得智库成为低水平信息传播的平台。还有一些媒体机构也开办了智库，使得智库与媒体的功能定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等方面仍有一定差距，其研究质量与思想创新能力相对滞后。突出表现在针对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不够，不少智库研究停留在媒体评论上，还有一些智库研究只是简单的资料分析，或者是把学术性文章直接改写为政策研究成果，远未达到国家决策所需的智力支持水平。

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目前，中国智库的国际化速度、广度以及国际影响力，尚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际关系的需要。主要表现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智库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建议

近年来，智库建设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不断得到完善，智库本身的机制构建和思想创新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从目前中国智库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来看，一些突出的问题值得深思、突破和改进。

的智库数量较少，智库公共外交的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智库思想创新力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影响力的薄弱，当前有些智库开展公共外交只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调研和会议交流上，缺乏深层次的问题沟通与分析。另外，智库的新媒体传播意识和能力与欧美国家智库的差距也很大。根据数据分析，大部分中国智库的网站几乎没有国际影响力，更不用说运用各种新媒体传播媒介了。

改革推动力需继续增强。我国智库建设从整体上说欣欣向荣，但也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官方智库、大学智库、民间智库发展都有各自的困境，也难以形成互补机制。在理想的智库发展状态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智库应是各具优势，并可以形成良性互补的。但是，目前部分官方智库改革乏力，有些大学智库建设缺乏核心推动力，而大部分的民间智库发展缺乏统筹规划和引领。

激励机制需进一步完善。当前，有些大学智库建设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漂浮孤岛”和“面子工程”现象。大学本应成为中国智库建设中最具创新动力的源泉，但当前大学智库在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建设上面子

工程较多，核心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普遍由兼职人员构成，使得大学智库成为漂浮在大学中的孤岛。另外，政策研究类成果在大学的职称评定体系中被边缘化，即便是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的研究成果也不被纳入职称评定，从事政策研究的学者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与荣誉。长此以往，大学智库将可能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生命力。

旋转门机制未能真正建立。目前，只有一部分退休官员有机会进入智库发挥余热，而智库的研究者鲜有机会进入政府，即使进入到了政府也被行政级别所束缚。

重视高水平专业智库的建设。当前，我国面临的内政外交问题前所未有的复杂，在金融、外交、军事等领域尤其需要高水平专业化智库的政策支持。但我国综合性智库居多，高水平的专业化智库非常缺乏，应尽快在相关领域选拔、确定几家专业智库。

避免资金来源影响智库研究的中立性。在各类智库中，有不少大学智库、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其中捐赠资金占很大比重，有的智库甚至有境外资金的注入。这一方面为各种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平台，但另一方面也对智库研究成果的

客观、中立立场产生了不可预估的影响，进而影响国家决策。

对策建议

宏观层面：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和智库理论建设。第一，中国智库必须建立适应自身发展模式的智库理论体系。智库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其政策研究直接影响着国家决策和社会思潮，如果智库自身的定位、功能、发展模式没有正确的理论框架所遵循，将会在智库泛化的道路上难以回头。第二，中国智库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把决策咨询纳入法定决策程序，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第三，完善信息支持政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使得政策研究者能够获得研究所需的准确信息与数据，这对于智库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四，进一步激发智库改革活力，落实国家智库政策，构建多元发展、互为补充的智库思想市场，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培养与规制。官方智库要充分发挥其渠道和信息优势，大学智库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

微观层面：全面完善智库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建设。首先，应借

鉴欧美现代智库管理制度，建立稳定、高效的智库运行机制。智库不是一个组织会议的平台或者临时搭建的松散研究团队，智库是知识密集型组织，尤其需要以真正实体化的组织建构、稳定的管理团队、高效的运行机制来为知识创新提供机制保障。其次，要建立适应智库发展需求的职称考核、评定机制。职称评定是专家学者在各自机构和领域发展的基本生存需求和价值认可的体现，当前很多机构对智库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智库研究成果不能纳入职称考核、评定体系，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可持续性。再次，应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政府除了从宏观上加强对智库的财政支持外，更要着力建设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尊重专家学者的思想价值。最后，应全面推动智库旋转门机制。现代智库一方面可以为中国培养一批既有坚实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高端政策人才，另一方面可以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治理提供一条制度化的通道。长远来看，可以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智库旋转严重不对称，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通道不畅和行政级别的约束。建议国家为智库学者进入政

府创建制度化通道，并在行政级别上不拘一格、唯才任职。

舆论引领与公共外交。第一，重视研究成果的选择性传播、有目的地进行议程设置和舆论引领。目前，我国智库在国内舆论传播网的构建层面，应该说已经做到了传播速度快、传播媒介多元，其薄弱点在于智库的思想力薄弱大大削减并制约了传播的效果。下一步要把重点放在选取有价值的思想成果，进行有目的的议程设置上，着眼于传播效果和舆论引领。第二，设立海外办公室，直接影响国外核心舆论场。我国智库应与世界各国智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及交流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问题的战略应对，另一方面将为国家大外交战略建立一条重要通道，通过与国外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影响国外智库，进而影响国外舆论和政策。具体地说，可效仿美国智库在海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的运作模式，在我国的重要国际关系国设立中国智库的海外办公室，以此为基点，在当地国家和地区进行政策研究、思想交流与舆论传播。第三，加强智库新媒体的传播能力。首先应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运用互联网思维、全球视野，把智库网站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媒介。另外，紧跟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结合受众需求，不断调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提升新媒体影响力作为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的突破口。

智库建设是百年大业，难以一蹴而就。我国智库建设，总体上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把机制建设作为基石，把人才和思想创新作为核心，将舆论传播建立在高质量的思想成果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智库。

智库探索

精准扶贫 要重视人的现代性教育

思想对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生活，应通过心理培养与知识教育来提高贫困人口思维的现代性，激发他们对新政策实施、新经济规律、新生产方式的接纳度，进而激发他们自己追求与建设美好生活的能力与潜力。

□ 贾海薇

最近连续参加多次关于“贫困治理”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这些会议上，偏远乡村的贫困问题获得了比较高的关注。

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目前国内外均以一定经济收入水平划线圈出相应的人群，已有研究表明，地理区位偏远、经济发展落后、文化现代化滞后的地区具有更大比例的贫困人口。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就是生活在山区、边区的农村中的农民，以最自然的方式从事农业劳作，遵循着农耕文明的各种规则规范。

通常而言，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是如影随形的，两者之间的高相关度已被揭示，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而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虽然经过多年的扶贫努力，仍然有很多地区呈现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叠加的双贫困样态。当前，虽然“造血”比“输血”的扶贫方式更有效的共识已经达成，但扶贫政

策与目标群体之间能否建立良好的心理联结、发生良性的心理互动直接影响着政策推行与经济帮扶的效果。

本地人的群体人格——基于认知能力、情绪稳度、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形成的现代性心理，是影响心理联结成功与否的重要变量。因为一个群体会对其他群体产生自然而然的排斥，特别是长期封闭的传统村落，其群体心理会对新注入的公共政策、价值观念、生产方式等产生强烈的反应。如果本地人的现代性心理较强，就会形成良性的反应，产生以欢迎、开放、接纳、支持、配合为特征的同化或顺应的心路历程；如果本地人的现代性心理较弱甚至完全不具备，就会形成不良的反应，产生以冷漠、保守、拒绝、抵制、反对为特征的抵御或反抗的心路历程。

有学者认为，长期定居、变化缓慢的农业社会往往会促成传统的性格导向，往往抗拒变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提出了具备现代性的人的十二个特征：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准备迎接社会的变迁；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个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重视生活和工作的计划性；尊重事实和知识；对人及社会具有可信赖性；重视专门技术，有意愿根据自我技术水平的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乐于让自己和其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相互了解、尊重和自

尊，主张非权势和平等相处，追求自由和民主；了解生产及谋生。概括起来，就是人的现代性集中表现在具有现代性心理——开放、开明、自信、自新、变化、变革；概括而言：个体的现代性集中表现为“主体选择的内在动机和行为取向”，因而人的现代性心理可以显著地促进人的现代性发展。

与物质贫困并不一定导致精神贫困一样，经济发展也并不一定导致心理发展，而思想对人的影响远大于物质生活，如果我们期望先通过尽快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再推动他们发生思想转变，不如尽快通过心理培养与知识教育来提高贫困人口思维的现代性，激发他们对新政策实施、新经济规律、新生产方式的接纳度，进而激发他们自己追求与建设美好生活的能力与潜力。“美丽乡村”建设的主旨之一就是让本地人的现代性快速觉醒，让他们自己行动起来，因为只有内生的发展才具备长期性的生命力。

因此，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应以“人的现代性教育”为开山利斧，彻底扫除盘踞在人们心中的各种消极心理倾向，如因循传统而害怕变化、因畏惧辛苦而害怕学习、因利益固化而不愿调整等，精准扶贫的造血工程才能在当地实现落地生根、长期见效。而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所应大力投入的，正是加强所有人的教育，特别是加强贫困人口的教育，使其普遍具有开放与开明、自信与自新、变化与变革的现代心理特征。

战略参考

质量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也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使我国经济发展一度进入“规模速度”的路径锁定状态，经济新常态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亟需打破这种传统路径依赖，进行“提质增效”的路径创造。为此，2012年国务院发布《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之后又连续5年出台系列质量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然而，尽管我国的质量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距离“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方面，供给侧的质量供给跟不上需求侧的质量诉求；另一方面，质量治理尚未脱离保障“质量安全”的老路，即以“监管”为核心进行质量建设，而不是以“发展”为核心进行质量提升。这些问题已成为质量建设深入推进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鉴于此，考虑到全球竞争的压力、公众诉求的提高和国家战略的需要，需赋予质量治理现代化“品牌、创新、开放”的现代内涵，以内在意蕴作为驱动质量提升的核心力量并辅之以科学监管的外部助力，最终实现质量治理的内外共建。

以品牌战略扩充质量内涵。品牌是质量的代言人和引路者，给质量提升赋予品牌的内涵是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从世界经验看，诸多发达国家通过品牌与质量的“捆绑”政策，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国家声誉、经济增长、文化输出的三赢。如德国、日本、韩国正是通过一系列“质量和品牌发掘、培育、发展、促进”的国家战略获得上述成功。我国以《纲要》和系列行动计划为指导，以质量、品牌提升工程为重点，从质量和品牌建设的立法、培育、评价、保护以及示范区建设等几个方面来做好“十三五”期间的质量、品牌建设工作。另外，除了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外，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根本力量，引导企业潜心专注品质提升。同时，赋予品牌经济以文化内涵，引导消费者对国产品牌树立信心，使自主品牌在本土环境落地生根。

以创新发展厚植质量基础。实现质量治理现代化不应仅强调技术创新在促进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应发挥管理创新在提质增效中的重要影响。一方

面，通过质量改进、质量公关和关键共性质量技术的攻克，推动质量技术万众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开展质量现场诊断、质量标杆经验交流等活动确定一系列的先进示范，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深度融合，共同作用于质量升级，以创新发展的乘法换取质量提升的加法。同时，鉴于质量提升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市场价值，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品牌是实现市场价值的核心渠道，因此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还应该促进创新驱动战略与品牌引领战略的深度融合，使技术创新与质量升级、品牌创建结合起来，谨防质量提升与价值实现的“两张皮”。

以国际视野培育质量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还应该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通过面向全球的顶层设计，输入型产品与输出型产品的齐抓共管以及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立体化安全网络的构建，引领中国产品走向世界。

首先，积极维护“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如开展“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一方面突出抓好跨境产品质量建设等，履行大国安全责任，另一方面为中国制造营造良好声势。其次，培育新型贸易方式，推进自主品牌出口增长，达到以质量换经济的目的。再次，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计量互认，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标准的针对性；最后，强化国际警务交流合作，严厉打击跨国、跨境制假售假犯罪，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保障进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

以科学监管助力质量升级。现代监管科学的进步主要在于监管工具选择和使用的合理性。就质量治理而言，以往我国主要着重于质量安全的事后治理，现代监管科学要求监管前移，即以“规范标准”为核心倒逼质量提升。而我国标准体系建设还相对落后，尤其表现在国际对标和标准体系共性平台建设等方面，未来应该就此进一步加强。同时，还应该更加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并重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手段在促进质量升级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质量治理的闭环系统。尽管科学监管有助于质量升级，但需要注意的是，监管只是质量保障的底线，而不是质量提升的主体，质量提升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市场，因

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

□ 郭薇

此，推进质量治理现代化除了政府的作用之外，更需要在企业自主、行业规范、政府引导、社会监督之间形成合力，充分展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觉、行业自律、社会自治手段并用的监管智慧，从而形成社会共建的质量培育环境。

总之，质量治理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质量意识提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质量安全监管，在内需和外驱的双重压力之下，其必须被赋予品牌、创新、开放、科学监管的时代特征，从而以国际化的视野和高度塑造中国制造的竞争新优势，展现大国风范，使“质量”真正成为兴国兴邦之道。

国家治理